

甘 南 藏 族 自 治 州

(非最后定稿 請注意保存)

甘南藏族自治州概況編輯委員會

一 九 六 零 年 十 月

目 錄

富饒壯麗的自治州	(1)
雄偉壯闊的大自然	(1)
富饒的物产資源	(2)
勤勞勇敢的各族人民	(3)
艱辛深重的旧歲月	(6)
生产資料占有和剝削形式	(6)
反动、黑暗、殘暴的政治統治	(9)
生产的衰退和各族人民生活極端貧困	(11)
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	(13)
各族人民的解放和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17)
各族人民欢庆解放	(17)
解放初期各項工作的开展	(17)
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	(20)
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偉大勝利	(25)
翻天覆地的土地革命运动	(25)
农业和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27)
資本主义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32)
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決定性勝利	(34)
反封建斗争的偉大勝利	(37)
总路綫、大躍進、人民公社	(41)
大跃进一日千里、人民公社应运而生	(41)
人民公社光芒万丈	(44)
经济、文化建設的輝煌成就	(56)
以粮为綱高速度发展的农业生产	(56)
稳定全面高速度发展的畜牧业生产	(63)
突飞猛进的工业建設	(67)
綠色宝庫	(72)
副业和漁业	(75)
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76)
遍布全州的邮电路綫	(78)
为政治、为生产、为羣众服务的財政貿易	(79)
一日千里的科学技术研究事业	(83)
万紫千紅的文化事业	(84)
日臻繁榮的教育事业	(86)
为各族人民健康服务的卫生和体育事业	(88)
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和社会風尚	(93)
高举毛泽东思想紅旗永勝前进	(99)

富饒壯麗的自治州

甘南藏族自治州位于甘肅省南部，南與四川省阿壩藏族自治州接壤，西與青海省果洛、黃南兩藏族自治州接壤，東北與本省臨夏回族自治州毗連，東南與本省定西、天水專區毗連。地理座標在東經101度15分——104度23分和北緯33度17分——36度10分之間。州轄一市三縣，即德烏魯市、臨潭縣、龍迭縣、洮江縣。自治州首府設德烏魯市。總面積約四萬四千多平方公里，是一個河山壯麗、土地肥沃、草原遼闊、森林茂密、礦藏富饒的好地方。

雄偉壯闊的大自然

甘南處於祖國青藏高原的東北部。東南連接隴南山區，形成西南高、東北較低的地勢，一般海拔在兩三千公尺以上。主要山脈有岷山、積石山、西傾山、迭山等。毛主席的充滿革命樂觀主義的“長征詩”里：“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後盡開顏”的岷山橫亘在州境南部，山勢巍峨，峯頂白雪皚皚，山腰雲煙繚繞，景致極為壯觀。岷山著名的天險臘子口，就是中國工农紅軍北上抗日時，粉碎國民黨反動軍隊的堵截，留下了永垂不朽的英雄史迹的地方。積石山與西傾山起伏在州境的西部，由於山勢較為平緩，成為一望無際、綠草油油的天然好牧場。迭山在臨潭縣南境，峯巒屏立，挺出競秀，每當秋天，山腰蒼松翠柏與山下果林綠竹交相輝映，景色明媚，其主峯高達五千多公尺，直插雲天，是自治州最高的地方。

重山迭嶺，萬頃草原間，滾滾奔流着黃河、白龍江、洮河、大夏河四條干流。黃河在洮江縣境繞積石山蜿蜒向西流成一大灣，即所謂“黃河九曲”的第一曲，這一段河水清澈平穩，灌溉着洮江縣的廣闊大牧場，并盛產湟魚、無鱗鯉魚和石花魚等，洮河發源于洮江縣境，的西傾山；白龍江發源于岷山北麓；大夏河發源于德烏魯市桑科的萬千山。這三條干流都流經主要農業區，水利資源豐富，給各族人民以灌溉田園和航運之利。更由於不少流段落差較大，水流湍急，目前已有十幾處用于發電，隨着地方工業的日益蓬勃發展，今後還將為甘南社會主義建設提供更多的動力。

氣候方面，西部和西南部較寒冷，東部和東南部較溫暖，大致可以分為冬干溫寒氣候區和冬干溫寒氣候區。冬干溫寒氣候區包括德烏魯市、洮江縣和臨潭縣，年平均氣溫約為攝氏2.4度，夏季平均最高氣溫為攝氏25度，冬季平均最低氣溫為攝氏零下20度以下；年降雨量平均為600公厘以上，多集中在每年的六至九月，約占全年降雨量的60%；年平均日照約為2,300—2,400小時。冬干溫寒氣候區主要是龍迭縣境，這裡緯度靠南，海拔高度較低，年平均氣溫為攝氏12度以上，夏季平均最高氣溫接近攝氏30度，冬季平均最低氣溫為攝氏零下25度；年降雨量約為450公厘，多集中在每年的五至九月；年平均日照為1,400——是自治州雨量及日照時數較少的地區2,000小時左右。甘南的土

壤以山地草原土和山地草甸土为主，河谷平原則多是含丰富有机物的森林灰鈣土和棕壤土，都是十分有利于农作物和牧草生长的肥沃土壤。象上述错综复杂的自然环境，多样性的气候，較多的雨量和充足的日照等，为本州农、林、牧、副、漁业的綜合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虽然部分地区冬季較冷，气温日差变化較大；霜期較長以及夏季易发生局部性的雹災等，但甘南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采取了許多积极措施，如封山育林，綠化荒山，建立气象网，加强天气预报等等，已经开始有效地控制与改变着不利于人們生产、生活活动的自然条件。

富饒的物產資源

甘南是甘肅省的糧畜基地之一。

农业区目前主要分布在白龙江、洮河、大夏河流域。根据普查了解，全州現在除有耕地一百几十万亩外，尚有上千万亩的土地面积可开垦为农耕地，这說明有着发展农业的莫大潜力。农作物的品种很多，其中粮食作物以青稞、春小麦为主，次有豌豆、蚕豆、玉米、糜子、燕麦等；經濟作物有油菜籽、胡麻、大麻、甜菜等。沿白龙江流域因气候温暖，灌溉方便，不仅年可种植作物兩次，还出产稻米、棉花、烟叶之类。解放前，甘南因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縛，生产落后，大部分地区很少种植或者根本不习惯种植蔬菜。解放以来，经过党和政府的号召，加上国营农場的示范影响，蔬菜种植面积逐年扩大，种类已达二、三十种。特別自1958年大跃进以来，許多原来不种植蔬菜的地区还出产了重达十几斤乃至几十斤的大白菜、大萝卜、大南瓜、大甜菜等，同时又試种成功黄瓜、韭菜、蕃茄等喜温作物，显示了自治州蔬菜和經濟作物种植业的前途同样是相当广闊的。

洮江县、德烏魯市絕大部分地区和临潭县部分地区有着水草丰茂的大牧场，面积总计大約兩万平方公里，占全州总面积的44%，盛长着分属于禾本科、沙草科、豆科、菊科等数十种营养丰富的牧草。因此，長久以来，甘南就是祖国有名的牲畜产地之一。牧区的牲畜以藏系綿羊、牦牛、花牛、馬为主，农区除了以上牲畜之外，普遍飼养猪、山羊、黄牛、驴、騾等。牦牛是甘南的主要耕畜和乳畜，体温高壯，負重力大，每头雌牦牛年产乳量达500公斤以上。洮江县乔科和欧拉等牧場的“乔科馬”（又名“河曲馬”）是馳名全国的优良馬种之一，体态匀称健美，性情驯良，持久力强，善于在草灘行走，可以輓乘兼用。“欧拉羊”是藏系綿羊的优良品种，体重达60多公斤。德烏魯市甘加地区出产的“甘加羊”，繁殖力强；其毛質纖維長，富有彈力，是制毯的优良毛型。解放十多年来，由于贯彻执行了党的保护与发展畜牧业的方针政策，畜牧业生产已由衰退不稳定的局面轉向稳定高速度发展的局面。

沿白龙江、洮河、大夏河流域，綿延着茂密无边、蒼郁蔽空的林海。林区面积达129万公顷，森林蓄积量非常丰富，大的树木有兩、三人合围那样粗，因此甘南不仅是甘肅省的主要林区，亦被譽称为祖国的“綠色宝庫”之一。林区的頂层和中层属混合乔木林，茂密地生长着冷杉、云杉、圆柏、油松、落叶松、樟等基本建設需要的优良用

材；林区底层除了生長建筑用材外，还盛长着各种果树和经济林木，如香脆多汁的梨儿、味甜如蜜的苹果、皮薄油多的核桃以及桃、杏、枇杷、樱桃、苹果、黑枣等果树和花椒树、桑树之类。

苍郁的林海中和辽阔的草原上，棲居着麝、鹿、羚羊、水獭、旱獭、扫雪、貂、獾、豹、熊、野猪、野牛、黄羊、野马等兽类和野鸡、锦鸡、马鸡、白天鹅等野禽，既可供食用，其兽类皮毛大多数可用来制革或作裘，質地柔軟，光澤美觀；又如鹿茸、麝香、熊胆、牛黄等更是名贵的藥材或香料。甘南同时是祖国主要的藥材产地之一，計产党参、大黄、麻黄、貝母、知母、茯苓、冬虫夏草、甘草、虫草等一百多种藥材，产量大，質量好。其它土特产品如延寿果（藏語称“蘇麻”）、狼肚、蘑菇等，随地可以挖拾，味美可口，营养丰富。如此众多的土特产都是甘南各族人民发展多种经济取用不竭的源泉。

甘南不仅地上资源丰富，地下资源也极其富饶。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不断勘察和1958年以来声势浩大的“千人寻、万人报”的群众报矿运动証明，重山迭嶂中隐藏着十分丰富的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計有：銅、鉄、鉛、鋅、金、銀等数十种，此外还出产煤和大理石等。今后随着地质工作进一步深入开展，将会探明更多質量高的地下宝藏，这为发展甘南地方工业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物质前提，在祖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設中已开始放出了绚丽的光芒。

甘南是宜工、宜农、宜牧、宜林、宜副的好地方，勤劳勇敢的甘南各族人民在党的正确领导下，高举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在国家的大力扶助和先进地区的帮助下，将在这块富饶的土地上，日益画上新更美、更美的图画，写上更新更美的文字。

勤劳勇敢的各族人民

甘南是一个以藏族为主体、汉族占多数的民族交错共居地区。生活在这个富庶土地上的藏、汉、回等七个民族，据1950年統計，共382,872人，其中藏族170,109人，約占总人口的44.4%；汉族191,336人，約占总人口的50%；回族20,635人，約占总人口的4.5%；其他还有散居的土、撒拉、蒙古、东乡等民族共約592人。大体上，德烏魯市、洮江縣和临潭县南部（即原卓尼县）的居民以藏族占多数，龙迭县、临潭县北部的居民以汉、回族占多数，其它各民族則散居各地。語言文字上，藏族人民說藏語的安多方言，并有本民族的文字。由于生产和生活上長期交往的結果，許多藏、汉、回族人民都相互通曉汉语或藏語。

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就共同开发了甘南这块富庶的地区，在長期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之間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不斷加强和友誼的不斷增長，是甘南民族关系的主流。

政治建制上：据历史文献記載，远在公元前三世紀——公元二世紀的秦、汉时代，当时中央封建王朝就在甘南設置了郡县地方行政机构，以后歷經唐、宋、元、明、清以至民国，中央政权在这里都有地方設置。1949年随着中国革命的偉大胜利和中华人民共

利國的誕生，甘南地區實現了和平解放。從此各族人民在祖國空前統一的各民族平等團結、互助友愛的大家庭中，政治生活上開始了新的巨大變化。在黨的民族政策的光輝照耀下，1954年成立了民族區域自治政權，實現了千百年來各族人民夢寐以求的當家作主的平等權利。繼而在1958年秋天，接着反封建鬥爭運動的徹底勝利，在黨的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和大躍進的光輝照耀下，甘南各族人民又熱烈響應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號召，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農村、牧區和城鎮共辦起了人民公社四十七個。人民公社象初升的太陽，促進了各項建設事業的全面持續大躍進，給甘南各族人民的发展和繁榮展示了無比廣闊的前途，同時使社會主義民族關係的大發展，在這一新的社會主義基礎上，更進一步堅如磐石般地鞏固起來。

經濟上，長期以來勤勞勇敢的各民族人民肩并肩地在甘南這塊土地上，共同开辟了田園，修建了城鎮和村莊，發展了畜牧業、農業、手工業和商業。據歷史文獻記載：公元三世紀前的漢代，就有了當時比較發展的畜牧業。公元五至六世紀的南北朝時代，今龍送縣一帶已種植谷物和桑、麻、棉等經濟作物，出產布、漆、臘等手工業品。到了公元七至十世紀的唐代，這里已經和中原地區有着廣泛的經濟聯繫，經常以馬匹、耕牛、皮毛、土特產品向中原交換茶葉和絹綢等物品。隨着歷史的發展，這種以茶、馬貿易為主要內容的經濟上互相依賴關係越來越緊密，因而在今臨潭縣城關和德烏魯市拉卜楞鎮等地便逐漸形成為民族貿易的市場。漢族和其他民族由於經商和屯墾等緣故，遷來甘南落戶的陸續增多，他們給甘南帶來了較為先進的農業和手工業生產技術。如德烏魯市、臨潭縣、龍送縣許多山坡上發現的田埂遺迹，據傳說是宋代移民屯墾的梯田，這也旁証了自古以來各民族就共同在甘南地區向自然界反復進行了艱巨的鬥爭。在長期向自然進行鬥爭的過程中，各民族都積累了豐富的生產經驗和技能。儘管如此，但解放前在三大封建領主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殘酷壓榨下，生產不僅得不到應有的發展，反而日趨衰落。只有解放後，各族人民在黨的領導和關懷下，經過十年來的艱苦努力，國民經濟各部門都迅速得到恢復和空前未有的大發展。在原來“天蒼蒼，野茫茫”的草原上，迅速地新建起初具規模的新興城市。如自治州首府——德烏魯市，解放前這里是一個空曠荒涼的大草灘。1955年開始動土興建，在短短的幾年內，就建設成為自治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的中心。在寬闊的街道和街心花園的兩側，分布着工業區、商業區、文教區和居民區。市區中心廣場上遍植着青松翠柏和其他花木，兩旁是自治州各機關的辦公樓，正中矗立着宏偉的人民會堂。市街上開設有百貨大樓、食品公司、電影院、書店、被服廠、食堂、旅舍、浴池等，大大便利了人民的需要。市區南面是文教中心，有報社、廣播電台、圖書館、學校、歌舞團、秦劇和豫劇團。市區的北面，有人民醫院、乳品廠、面粉廠、機械廠、發電廠、皮革廠、腸衣廠、冷藏廠、汽車站等。所有這一切應當說還僅僅是開始，伴隨着甘南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蓬勃發展，德烏魯市將比現在的規模還要擴充幾倍，建設成為一個氣勢雄偉、工廠林立、繁榮美麗的新型現代化城市。

甘南各族人民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化艺术遗产。举如歌舞和

戏剧、繪画和雕塑、刺綉和剪紙等都具有深厚的傳統，为各族人民所喜爱。藏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少，普遍喜歌善舞，舞姿优美活潑。歌唱往往是以相对酬唱的形式出現，其中如“洛朗果”是藏族人民庆賀节日婚宴时的酒曲；藏族人民的“拉伊”和汉、回族人民的“花儿”是田林牧野間互相和唱的山歌，都以比喻开头，声調高亢豪放，歌詞优美，內容清新健康。解放后，各族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之后，創作的歌舞都充滿新鮮喜悅的时代气息，以生动感人的歌舞来歌颂党和毛主席給人民带来了自由幸福的生活，反映人民羣众在偉大变革和跃进时代的新面貌。甘南各民族都热爱戏剧，除了“秦剧”以外，还有“藏戏”。藏戏无论在乐器、道具、表演技巧上，既有本民族风格，还广泛吸取了汉族的演奏特点，深受羣众喜爱和傳頌。除了歌舞戏剧外，再如形象生动、工精技巧的繪画和雕塑，色彩鮮艳、制作逼真的酥油花，細致精美、內容丰富的刺綉和剪紙，構造堅固、規模宏大的古代寺庙建筑等，都充分反映了甘南各族人民卓越的想象力和无穷无尽的創造智慧，反映了甘南各民族自古以来就有着頻繁而广泛的文化接触和交流。

甘南各族人民是勤勞勇敢、富有創造智慧的民族，历史上对締造偉大祖国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都有自己不可磨滅的貢獻。但解放前在黑暗、反动、殘酷的封建压迫剝削下，各族劳动人民却世代代过着牛馬不如的痛苦生活。唯有解放后，在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人民羣众成了这块富饒土地上的主人，才真正开始了政治、經濟、文化繁榮昌盛的时代。十多年来的輝煌成就，远远超过以往几百年、几千年历史发展的总和。目前，甘南各族人民，正昂首闊步、意气风发地高举着毛澤东思想的紅旗，沿着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所指引的康庄大道，根据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的方針，充分利用大自然取用不竭的巨大財富，为彻底改变甘南“更穷更白”的面貌，把甘南建設成为雄厚的粮畜基地，建設成为祖国的具有現代化工业、現代化农牧业、現代化的科学文化事业的自治州而奋勇前进。展望自治州的前景，犹如燦爛的朝霞，光芒万里。

災難深重的旧岁月

解放前，甘南是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一个基本上处于封建农奴制发展阶段地区。由于遭受国民党反动派和地方封建主的民族和阶级双重压迫，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上和全国比较起来，表现得更加落后和不平衡。

经济区划大体上分为牧区、农区和农牧交错区三种类型。牧区和农牧交错区包括洮江县、德烏魯市和临潭县的南部(即原卓尼县)，这里存在着比较完整的封建农奴制度。农区主要在龙迭县和临潭县北部(即原临潭县)，这里除了存在封建农奴制度外，在汉、回族聚居的地区，地主经济已占主导地位。无论农区、牧区和农牧交错区，主要生产资料——牲畜和耕地绝大部分被三大封建领主：(一)土司、土官、头人；(二)地主、牧主；(三)寺院封建上层所占有。其余如牧场、森林等也操纵在三大封建领主之手。三大封建领主还拥有一套完整的封建特权制度，他们凭借武装、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勾结蒋介石、马步芳匪帮和帝国主义分子，对各族人民进行暗无天日的统治和残酷的剥削。农牧民群众终身被束缚在封建领地上，人身依附于三大封建领主，政治上毫无权利可言，生产十分落后，生活极端困苦。为了反对残暴、野蛮、黑暗、反动的封建统治剥削制度，各族农牧民曾前仆后继地进行了英勇的反抗斗争，每一次斗争都给封建反动统治者以沉重的打击。

生产资料占有和剥削形式

甘南地区解放前的生产资料占有异常集中。在牧区，约占人口总数5——10%的土官、头人、寺院上层、牧主和富牧占有主要生产资料——牲畜总数的80%以上，占牧区人口总数90%以上的劳动牧民群众占有的牲畜总数还不到20%，而劳动牧民中的贫牧和赤贫牧更很少有或根本没有牲畜。有的地方，牲畜占有更为集中。根据对拉卜楞寺封建上层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德烏魯市一地就占有马9,540匹、牛7,430头、羊36,510只，其中贡唐仓一人就占有马800多匹、牛3,000多头、羊5,000多只。除了牲畜，牧区另一生产资料——草山和牧场的主要占有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名义上属全部落成员所有，实际支配权都完全被封建主、牧主等组成的“格尔岗站”(部落内最高封建统治机构)所操纵。除了“部落所有制”外，许多地区也有纯归封建主个人使用的牧场，牧民的牲畜不得进入放牧，违者，轻则罚款，重则没收牲畜。

在农区和农牧交错区存在封建农奴制的地区，全部土地(包括耕地、森林、荒地、小块牧场等)分别为土司、土官、寺院(实际是寺院封建上层)等封建主所有。如卓尼地区的土地全部为土司的“兵馬田”，美武地区的土地全属土官的“皇粮地”，拉卜楞镇和附近十三庄的土地全归拉卜楞寺所有等。这些地区的农民在承担封建主的沉重无偿劳役和贡赋的前提下，世代代领种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区又由于商品经济的影响和封

建主殘酷剝削的結果，伴隨廣大農民的日益破產，在沿交通干道的地區出現了份地使用權的買賣現象，因而也產生了一小撮相當於漢區的二地主和富農，他們同樣是當地剝削佃戶或雇工，并把封建賦役轉嫁在貧苦農民的肩頭上。龍送縣和臨潭縣地主經濟已占主導地位的地區，土地集中現象同樣嚴重。占人口總數不到10%的地主和富農約占有耕地總數的70—80%，廣大勞動農民只占有耕地總數的20—30%左右。如披着伊斯蘭教外衣的“西道堂”封建集團的上層分子，在解放前不到四十年的光景，投靠蔣介石、馬步芳匪幫，拿宗教作幌子，以賤價強購、公開霸占等各種毒辣手段，據不完全統計，僅在臨潭縣一地就佔據了耕地6,780畝、大家畜800多头（匹）、小家畜450多只、各種大車442輛、牧場兩座、林山16座、水磨17盤及巨額的商業資本，成為惡霸一方的披着宗教外衣的大地主兼大資本家。

這種生產資料占有極其懸殊的情況，決定了當時社會成員被分為兩大對立階級：封建剝削階級（包括土司、土官、頭人、寺院上層、地主、牧主），約占社會總人口的5%左右，他們擁有政治、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封建特權，構成甘南地區的三大封建領主；被剝削階級（包括勞動農牧民羣眾、小手工業者以及寺院中貧苦農牧民家庭出身的下層喇嘛），約占社會總人口的90%以上，他們在經濟上處於從屬地位，政治上更毫無權利。在封建農奴制地區濃厚地存在着人身依附關係，廣大勞動農牧民終身被束縛在部落的範圍內，沒有遷徙自由，甚至連婚權、親權、財權等都受到干涉。農牧民的子女出嫁或招贅到別的部落，必須向封建主交一定的財物“贖身”，方許離開部落。封建主可以任意指定所屬農牧民子弟出家當喇嘛，一般是二男抽一或三男抽二。封建主甚至可以將所轄的土地連同住戶贈送親友和賠償命價，如公元1920年拉卜楞寺封建上層因打死美武土官的兄弟，將崗察地區的土地和150多戶居民作為命價劃歸美武土官。如果農牧民死後無嗣，封建主有“吃絕業”的特權；或者農牧民年老喪失勞動力，又無子女接替服役納貢，全部家產必須交給封建主，因而可以說農牧民的財權也是十分不穩定的。

甘南的喇嘛寺院作為社會組織，完全是等級森嚴的封建農奴社會的縮影。土司、頭人、牧主等家庭出身的寺院上層，佔據大量的生產資料和財富，同時掌握寺廟的所有財產，他們給自己規定了廣泛的封建特權，因而是封建主階級的重要組成分子。廣大貧苦農牧民家庭出身的下層喇嘛，他們除承擔寺內一切苦役外，還要兼當寺院上層的私人雜役，為活佛、僧官等砍柴、掃地、做飯、飼養牲口乃至背糞倒尿等，肉體上和精神上都遭盡摧殘，生活境遇十分悲慘，實質上都是封建主階級任意宰割的農奴。除了喇嘛寺院，披着伊斯蘭教外衣的西道堂也是等級制度極其森嚴的封建組織。道堂內的人分為三等，所謂“上等人”就是掌握全堂經濟命脈和政治、宗教大權的四家大地主；“中等人”基本上都是四家大地主的親戚和爪牙；“下等人”全是被騙入堂的貧苦農民，是堂內世世代代沒有人身自由的變象奴隸。對不同等級的人的衣、食、住、行、生、養、婚、葬等所有方面都規定了一套嚴格的制度。對這種極端懸殊的等級制度，羣眾曾作了如下概括的描述：“上等人金銀銅碗，中等人只吃不管（不勞動），下等人氣斷工滿（即只要還有一口氣也要

服苦役)。”这极深刻地说明“西道堂”组织中的阶级对立同样是十分尖锐的。

三大封建领主凭借种种封建特权霸占着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财富,对广大劳动农牧民进行极其残酷的剥削。

徭役(即“乌拉差役”)和贡赋是封建主任意宰割农牧民的重要手段。凡是封建主领地内的农牧民都必须向封建主服一切无偿劳役。诸如牧业生产上的放牧、剪毛、接羔、割草、制酥油、揉皮张、捻毛线、制毡,农业生产上的耕种、收割、炒磨青稞,其它如修建、驮运、背水、拾柴、通讯、警卫以及接送官吏过境等包罗万象的劳役,都要由农牧民轮流承担,期限往往占掉一年中劳动日总数的30—50%,如遇有修建工程,所占时间更多。服役时一般都要自带口粮、牲畜和工具。封建主派有爪牙监督服役的农牧民,农牧民稍有意慢,便遭到辱骂、鞭笞和罚款。除了支应无偿劳役,还必须交纳各种贡赋。牧民必须在一年中按规定给封建主交一定的牛奶、酥油、畜肉、羊毛和皮张等,农民一年必须向封建主交一定的“兵马粮”或“皇粮”,除此而外,如柴草、土特产品都要依“例”缴纳。其中如美武士官一年仅收皇粮、皇草就约折合八万元(银元,下同),卓尼土司规定农户每年给他交鹿茸、麝香、兽皮、家禽、蛋品等种类繁多的贡纳。

地租和畜租剥削。地租主要分死租和分成租,都交纳实物。一亩土地的死租相当一般年产量的60%以上,即是荒年,颗粒也不得短欠;如是丰年,往往还要另向地主送礼。分成租(又称“伙种”)的剥削量更较沉重,寺院的土地大都采用这种剥削方式,地主只出种籽,佃户负担全部劳力、畜力、肥料,秋收时地主首先扣除种籽后再对分,连庄稼草也要对分,剥削额一般达70%。畜租(又称“代牧”)以奶畜居多,一头雌犏牛年交酥油40—50市斤,代牧户一年辛勤所得的只是一些奶渣、牛毛和死亡的小犏皮。代牧绵羊,也只能得到羊头部和腿部上质量最差的毛。代牧户除了交纳畜产品外,还得另交一定的牧草和牛粪。如因灾害无法交纳规定的畜租,牧主不仅将代牧的牲畜赶回,并牵走代牧户的牲畜作抵偿。

雇工剥削。牧区的长工除由牧主供应粗糙的饭食外,工资每年约15—20元,另给一两件破旧衣服和两双家制靴子,但每个长工要放牧700—800只羊或100多头牛马,并要求牲畜繁殖得很快,放牧时还要挤出时间为牧主干其它杂活,劳动量极大,牧工不可能达到这一标准,因此每年工资都被扣几元至十几元。童工和女工的待遇更低,除给两件破烂衣服御寒外,每年顶多再给一头老弱的羊只或两三元钱。牧主雇短工主要为了剪毛、揉皮张、制毡等,大多以天计算,除供饭食外,一般只给一点奶渣或炒面。在农区,雇工的工资同样十分低微,很难维持家庭的最低生活。土官、头人和地、牧主还以“养子”、“女婿”、“入道堂”等动听的名义诈骗无所依靠的青年供其牛马般的驱使。如牧民卓玛从十一岁被牧主以“养女”的名义骗去服无偿劳役,一直到四十岁,因病丧失劳力,便被牧主踢出门外。马福银年青时被西道堂雇为长工,七年后被诬为贼,遭受毒打,他要求算帐回家,掌櫃对他說:“你已入道堂,还那来的工钱?”诸如以上的事例,实质上

都是变象的无偿苦役。

高利贷是三大封建领主吮吸农牧民膏血的重要手段。高利贷利率如春借秋还还是30—50%，实际等于年利的60—100%，有的利率甚至高达本金的两倍乃至更多倍。差不多所有的寺院都设有专人管理放债事务，他们通过部落头人将粮食、酥油、银元摊派给认为有油水可榨取的农牧民，不借是不行的。牧民娘格尔借黑错寺260元，月息16元，五年共交利息60元，以后无力再付，被关进寺院监狱，迫使他将所有家产交给寺院抵债，结果还说下欠180元。有一种变象的高利贷称为“不死牛”，封建主贷放一头奶牛给牧民并规定年交畜产品若干，在奶牛老死或病死后仍得年年如数交畜产品。还有一种“子孙债”，只许还利、不许还本。如临潭县的加细旦珠，在他曾祖父时，当地寺院强贷与100斤粮食，规定年交息粮60斤，四代人父死子承地一直交到解放。寺院强迫性的宗教负担在群众无力交纳时便往往折成高利贷。解放初期在仁安部落调查，全部落欠拉卜楞寺8,000多元，几乎全是宗教摊派折成的。因而，高利贷就象一条铁链，一经套上就往往将农牧民拖向家破人亡的深渊。

反动、黑暗、残暴的政治统治

解放前甘南地区存在着土司、土官、部落头人的封建农奴制度以及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喇嘛寺院也规定了一套政治特权制度。在这种反动、黑暗、残暴的政治统治下，整个社会极为混乱不安定，农牧民的痛苦不可言状。

国民党反动派在龙迭、临潭县和拉卜楞镇等地都设置了伪县政府，推行反动的保甲制度，遣派忠实爪牙充当伪县长和委派当地的地主和富农充作保、甲长来直接统治人民群众。在其势力不能直接达到的地区，则继承历史上各封建王朝的“分而治之”办法，分别给当地封建主“保安司令”、“国大代表”、“立法委员”、“护国禅师”等官爵封号以笼络他们，通过他们来分别统治其所辖地区的农牧民。因而这种政权，实质上是国民党官僚买办阶级和甘南三大封建领主对劳动农牧民群众的联合专政。国民党反动派为了巩固其统治和分化各族人民的斗争力量，榨取各族人民的血汗，大肆利用和挑拨民族间和民族内部的纠纷事件，从而使甘南地区民族械斗、仇杀等事件不断发生。如甘加与青海甲吾部落的封建主为争夺秀石强武草山而引起的械斗纠纷，国民党除假借调解为名进行敲榨勒索之外，最后在双方的草山管理执照上，给一方涂上这个草山的图界，给另一方签注这一草山归其管辖，双方都认为这草山归自己所有，使纠纷延续了35年之久，愈演愈烈，直到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调解这一纠纷的过程中，双方拿出凭证对照，才揭穿这一毒辣的阴谋。

除国民党反动政权外，各世袭土司、土官都设有衙门。卓尼土司衙门下设四十八旗，旗各分辖数目不等的村庄，由土司、总管、旗长、头人等组成一整套系统的封建统治机构。部落为封建统治的基层组织，各辖若干帐篷圈和自然村，由世袭部落头人为首组成的“格尔岗”总览全部落的一切大权。世俗封建主将寺院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主要支柱，不遗余力地扶植寺院的封建势力，扶植自己的亲属为寺院僧官、活佛等当权人物。如卓

尼土司自明代以来就一直沿襲着：兄为土司、弟为僧官，遇有独子，兩职并兼的制度。較大的寺院都有一套严密的政权机构。如拉卜楞寺院設有“議仓”，由当权上层組成“議仓會議”，为所轄地区的最高权力和行政机构。議仓可以派任“郭哇”(头人)或“更察布”(寺院代表)到所属各部落主持“格尔崗昂”，和部落内的头人、牧主等共同处决一切重大事件。这充分表明了寺院和土司、土官、头人、牧主、地主等三位一体的相互依存关系。

土司、土官、大头人和寺院拥有武装，設有監獄、法庭等鎮压人民的工具。他們在处决轄区羣众的民刑事事件时，照例要索取开口錢、閉口錢和均分賠償費等。农牧民稍有違抗，他們便認為是犯“法”。犯“小法”打一百皮鞭罰款百元；犯“大法”打一百皮鞭罰款200元；如果更严重一点就帶上脚鐐手铐，打入地牢、水牢、穴牢，处以扎籤、抽筋、割五官、剜心、剖腹、投河等等灭絕人性的酷刑，許多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就这样被他們处置成終身殘疾甚至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封建主还強迫农牧民买枪备馬，組織封建武装。土司、土官和大寺院設有“聶耳哇”等不同名称的帶兵官，專門率領封建常备武装，用来对付人民的反抗，爭夺統治地盤和进行民族仇杀，因而这种武装給各族人民帶來了极大的災害。如当时甘加与甲吾等十一件民族間和民族内部的糾紛仇杀事件，就死亡了311人，伤35人，損失各类牲畜76,000多头(只)，燒毀房舍、帳篷、衣物不計其数，被国民党从中榨取了59万元。其中如美武部落的封建主与北山部落的封建主为爭夺草山的武装械斗，自公元1891就开始，持續約60年，其中1942年的一次大械斗中死伤50人，在上、下卡加和日多麻等村焚燒擄掠得十分惨重，使这里的人民直到解放时还困苦不堪。

封建反动統治者和国民党反动政权还凭借政治特权地位，向各族人民进行了瘋狂的超經濟掠夺。土司、土官、头人、寺院向集鎮上的商販和手工业者征收开业錢、地皮錢、草头錢、水錢等，向过境商人、驮脚戶征收入境錢、厘金之类。如拉卜楞鎮的居民自盖的房屋每年每間房得出地皮錢一元，驮脚戶过境每头驮畜要交15—20个銅元，买卖成交还要交近貨值十分之一的厘金。黑錯寺向寺前集鎮征收这类封建稅金，据当时一季的估計就約达5,000元。此外，每当逢年过节、婚喪事件和封建主承襲职位及迎亲訪友等，农牧民、手工业者和攤販都得送礼或按戶分攤費用。如1958年拉卜楞寺上层为了在政治上进一步投靠国民党，向国民党献飞机三十架，約折合62万元，全数向轄区的羣众攤派；临解放前不久，該寺寺主死了，为修金銀質骨塔，对所轄部落各攤派一万元以上的費用。

寺院封建上层利用宗教名义，規定了一套剝削制度，作为他們橫征暴斂、发財致富的特权手段。各寺院一年中几乎月月都規定有例行庙会。根据对拉卜楞、黑錯、禪定等三个較大寺院的不完全統計，每年例行庙会費用竟达100万元以上。这笔龐大的費用全通过各所轄部落头人向农牧民攤派，而大部分落入寺院封建上层之手。除定期例行庙会外，其它不定期向寺院供經、供飯的次数就更多，这同样是強制性的，每派一次由数百元到万元不等，即使忍飢挨冻、傾家蕩产也得照数交納。因此农牧民中流行一句話：“供大經，富变穷，穷变乞。”如阿木去乎部落的周？种地四十多亩，有牛六头、馬兩匹、羊二十只，被派了一場經以后家中财产蕩然一空，还負債200多元。完系灘的貢保扎西因不

僱承担派經，被寺院枷押起来，結果花了2,000元供一場經才被釋放。諸如此类的事例很普遍，农牧民憤恨地說：“寺院對我們就象對韭菜一樣，隨長隨割。”另外，每當秋高畜肥和庄稼收获季节，成批的活佛、上层喇嘛甚至西藏的寺院都來甘南各地化布施，每到一地，由土官、头人派爪牙挨戶通知和攤派數目，实际上也形成了攤派制度。寺院上层對农牧民生产上的播种、收割、放牧、災害和生活上的生、养、婚、葬、迁徙、疾病等一切事件都規定了一套念經制度，要念“擋雨經”、“丰收經”、“保畜平安經”、“消災經”、“吉祥如意經”等，每念一次經，部落或個人都得宰牲畜、送禮和交納念經費。寺院上层還將旧衣服撕成的碎条和头发、指甲、殘羹剩飯等當作“灵丹妙藥”愚弄农牧民以榨取錢財。农牧民死后，生前所用的衣物還必須交給寺院。象这种无孔不入的封建特权剝削，农牧民羣众總結為：“能騙就騙，不能騙就派，派不到就搶。”

国民党反动政权在势力能够直接達到的地区普遍設立关卡，向各族人民攤派名目繁多的巨額糧款。就田粮一項有夏粮、秋粮、屯粮等，其中屯粮最重，約占产量的3%。苛捐杂稅仅有名目可查的就達三、四十种，据拉卜楞鎮一地的統計，每年就達12万元左右。各地伪政权还勒令羣众“送”土特产，仅仁安部落60多戶牧民，一年內就依“例”給伪夏河县政府繳菜牛兩头和羊二十五只，此外還有皮張等物。兵款和馬款是各族人民迄今尤切齒痛恨的，不管家中有无青年，按戶攤派，二丁頂一馬，有馬出馬，无馬出款，每年每戶要出約值一头牛价的兵馬款。其強征來的馬匹就地霸占草山放牧，如果当地人民的牲畜誤入其划定的范围，即被打上烙印沒收。又如1921年青海軍閥馬麒力圖擴張地盤和奴役甘南各族人民，派兵占据今德烏魯市和洮江县，展开了瘋狂掠奪。兽軍所过，人民被大批殘杀，牲畜被擄掠一空，房舍、帳篷被焚千余处，造成这一地区長期滿目荒涼无人烟的慘狀。在臨潭一帶，馬步芳匪帮和西道堂互相勾結，除进行壟斷性的极不等价的商业掠奪外，并強占沿洮河一帶林区，開設“西北木厂”，在其“林尽归山”的掠奪方式下，使这一帶的森林遭到严重的破坏。在这不胜一一例举的橫征暴斂下，更加深了甘南各族人民的苦难。

生產的衰退和各族人民生活的極端貧困

在封建农奴制的严重束縛下，解放前甘南地区的生产极其落后。

畜牧业生产方面：在部落割据的情况下，草原使用极不合理，浪費現象严重，牲畜听任自然繁殖，一般劳动牧民都无力貯备飼料、修棚搭圈和改善經營管理。生产工具只有皮繩、馬絆、奶桶、奶鉤、刀子之类，都相当簡單落后，鉄制工具十分缺乏，大部分牧区普遍用刀子割羊毛和木棍拔牛毛。幼畜成活率很低，一般还不到50%；畜羣秋肥、冬乏、春死亡的現象严重而普遍。再加上封建主和国民党挑起的民族糾紛所造成的社会秩序极不安定的情况，更使得生产日趋衰落和不稳定。許多牧場毒草叢生，虫兽害和疫病蔓延，草場利用面积一年比一年縮小，广大牧区因畜产品沒有銷路，以致造成羊毛不剪和腸衣喂狗的現象。

農業生產方面：普遍用輪歇耕種，廣種薄收，耕作粗放。甘南雖有較良好的灌溉條件，但當時水澆地面積卻很小。生產工具主要是二牛抬耜”鋤頭、鐮刀、連枷等，都相當落后，效率很低。個別山區還殘存刀耕火種的耕作方法。糧食作物一般畝產還不到100斤，故當時甘南一直是嚴重缺糧區。在反動統治者的殘暴壓榨下，人力和畜力被強征，工具被破壞，水利失修，使生產發展水平原本不高的農業越發衰退，災荒連年，許多耕地被荒蕪了。

手工業和副業：甘南手工業長期處於發展遲緩的狀況。城鎮中雖有獨立的制革、織毯或金、銀、銅、鐵器的加工、木作、制靴、土染等行業，但規模很小，資金也不足，大都以來料加工為主，成品出售為輔。除此而外，其他生產、生活用品如制皮繩、織毯、揉皮、制毡、編筐等，以及其它如采藥、打獵、伐木、燒炭等副業生產都未從農、牧業中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經濟門類。

商業和交換：由於各民族從事的经济門類不同，很久以來甘南與祖國各地就有密切的商業交往。許多小商小販在促進民族間和祖國各地區之間的經濟聯繫上，曾起到過積極的作用。在臨潭縣城關和銀烏魯市拉卜楞鎮等地都是當時甘南較發達的商業市場，各有大小商鋪二、三百家。其他如寺院附近的“叢拉”（早聚午散的市場），也是农牧民買賣和進行物物交換的場所。但自從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勢力和官僚買辦資本伸入後，便使商業交換越來越走上畸形的發展。許多封建主獨資或集資往來於西藏邊境從事大規模的走私活動。根據對拉卜楞寺的封建上層的不完全統計，他們共組織了三個商隊，資金達一百幾十萬元，專門走私販賣英、印奢侈品和搞販金、銀等。臨潭西道堂大地主也與馬匪步芳的官僚資本緊密勾結，組織了兩隊各擁獸畜100頭以上的武裝商團，往來甘、青、川邊境從事掠奪性商業活動。他們以極不等價的交換和大斗（秤）進、小斗（秤）出等欺騙手段進行超經濟剝削，並為牟取暴利，甚至大量販賣武器和毒品，因而更加劇了當時甘南地區的社會危機。

極端殘酷的封建壓迫剝削制度造成了社會生產日趨衰退的嚴重情況，使甘南各族人民羣眾愈來愈多地走向啼飢號寒、流離失所和無以維生的境地。據拉卜楞鎮附近是喀村的調查，該村四十多戶人家共耕寺院380亩土地，每年向寺院交納封建貢賦後，所剩尚不夠全村四個月的食用。如果再加上宗教負擔和國民黨苛捐雜稅的勒索，所剩更寥寥無幾了。因而全村絕大多數人家全賴給寺院，牧主背水、賣燒柴、當雇工來勉強維持半飢半飽的生活。全村有十一戶沒有房屋，即是有住房的人家也都是低小阴湿、人畜雜居的破爛土房。全村沒有一戶有被子，人們睡覺時就是將老羊皮襖裹身，脫下靴子當枕頭。又如今臨潭縣洮北公社富強生產隊二百五十戶農民，在解放前，一百零四戶是佃戶，四十一戶給地主拉長工，五十三戶靠打短工度日，還有十幾戶人家是上無片瓦、下無寸土的乞討戶。廣大牧區勞動人民根本穿不起布，終年一件光板羊皮襖，冷時就全部穿上，熱了就纏掛在腰間。茶是牧區生活中不可缺少的飲料，然而貧苦人家很少能買得起，經常都是摘些蕨麻葉熬水代替。由於人民羣眾的生活極端貧困，伴隨而來的就是關節炎、腸胃炎、砂眼、天花等疾病的廣泛流行，嚴重危害着廣大农牧民的身體健康，少數民族人口日趨

下降。这种痛苦万状的生活，藏族劳动人民常在他们的民歌中悲愤地唱道：

离家的孤鸟儿，今日虽在这里棲落，
明朝不知飞向何方！
草原上流浪的人啊，今日虽在这儿藏身，
明日不知奔向何方！

再如四、仅劳动人民中流传甚广的一首民歌：

两粒吊命饭，野菜浮芋蛋；
吃饭没点盐，等过新年。
冬腊“三九”天，身穿破麻衫；
里面装乱麻，当被又当毡。
丈夫十七八，没有遮羞裙。
婆娘生孩子，保长就盘算，
又抓兵、又交税，提起心胆寒。

这两首民歌，正是当时各族劳动群众流离失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生活写照。但是那一小撮封建统治阶级却过着穷奢极欲、荒淫糜烂的生活。他们住着富丽堂皇、雕梁画栋的大厦；吃着山珍海味、羊羔美酒的饭食；穿着绸缎毛呢、珍贵华丽的衣服，并戴着重达几十斤的金银珠翠的首饰。两相对照，形成贫富极端悬殊的图景。

劳动人民由于衣食尚且自顾不暇，实际上也被剥夺了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反动统治者为了装点门面，培养为他们服务的爪牙，也在为数有限的几个城镇上办了一些学校，至于广大的农村和牧区，一直是教育的空白点。所办的学校，不但破爛不堪，师資条件极差，甚至还是搜刮人民钱财的工具。如龙迭县武坪乡的一所学校，儿童入学必须先交银元若干和羊毛褥子数张，以后还得随时向学校当局送土特产。西道堂大地主也办了兩所学校，但堂内各阶级受教育都是有严格区别的，下层人的子弟即是被允许上学，也不过认得几个字后就被遣往田庄、牧场中服劳役，中层人的子弟方可上到中学，至于当权大地主的子弟便送往蘭州、北平(京)、成都等地读中学和大学。民族文字在学校是受歧视的，喇嘛寺是唯一可学藏文的场所，故寺院在实际上完全操纵了藏族人民学习本民族文字的权利，何况所学的又是经典文，和群众语言完全脱节，很难在生产生活中应用，因而造成藏族广大群众文化科学知识极端落后的状况。

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

勤劳勇敢的甘南各族人民在历史上有着反抗统治阶级的光荣斗争传统。早在公元十世纪的唐末反抗吐蕃奴隶主的西北“盖末”(或称“浑末”)大起义，范围就包括甘南地区。公元十三到十四世纪的元代，包括甘南地区的“西蕃”人民反抗封建压迫和民族压迫的斗争前后共二百多起。公元十八、十九世纪西北回民反抗清朝民族压迫的斗争

一直不断，差不多每次都得到这里的回族和其他民族人民的响应和支持。多次的起义斗争，在我国史籍上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光輝。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社会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更日益加深了全国各民族人民的苦难，使各族人民的生存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严重的威胁。共同的命运，将甘南各民族人民和祖国各地区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成血肉般不可分的整体，一致进行了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反抗斗争。特别是自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全国革命形势更为高涨的情况下，甘南各族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力量也发展得越加壮大，斗争的烈火燃烧得一次比一次更为猛烈。这时除了此起彼伏的小规模的抗租、抗款、抗租、抗乌拉差役的自发性阶级斗争之外，具有较大规模和深远影响的反抗斗争如：

公元1914年在全国反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农民起义的影响下，西固县（今龙迭县）汉、藏等民族二千多人提出了抗粮、抗款为正义斗争口号，掀起了自发性的起义。起义军在平定关和九原里一带森林茂密的地方修筑了工事，向北洋军阀派来的军队展开激战。这次起义，反动军阀虽然以优势武力进行镇压，斗争仍然坚持了一个多月，深刻地反映了甘南各族人民反抗斗争意志的高昂不屈。

公元1924年—1927年今德烏魯市和洮江县一带的广大藏族人民，对青海军阀馬麒的殘酷压榨，展开了长期的頑强斗争。在历次反抗斗争中，尽管馬匪都假意以小恩小惠来籠絡回、汉族羣众，千方百计挑撥民族之间的关系，企图将人民的斗争視綫轉移到民族糾紛械斗方面去，便于从中漁利。但各族劳动人民始終未受蒙騙，在斗争中互相帮助、互相声援，进一步地发展了各族人民长期以来的傳統友谊，粉碎了馬匪企图長期霸据甘南的阴谋，终于将青海反动駐軍赶出了德烏魯市和洮江县地区。

公元1935年—1936年，震憾世界的中国工农紅軍长征的第一、第二、第四方面軍，在以毛澤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北上抗日，迎接全国日益蓬勃发展的抗日民主运动和即将重新到来的革命高潮，以无比英勇卓絕的革命毅力通过雪山草地之后，相繼进抵甘南。当第一方面軍于1935年9月首先进抵甘南时，国民党鲁大昌匪部在岷山的必經要地——天險臘子口，依仗悬崖絕壁、水流急湍的地势，遍筑碉堡，派駐三个团的反动武装，妄图阻撓紅軍北进，扼杀中国工农革命运动和破坏抗日运动。但反动派的一切堵截，在偉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久經鍛煉、无坚不摧的工农紅軍面前，遭到粉碎性的打击。在林彪同志亲自指揮下的紅軍先头兵团的英雄們，在当地各族羣众的支持下，从9月16日黄昏开始进攻，在短短的十多个鐘头内便彻底解决了这一战役，将鲁大昌匪部打击得潰不成軍，仓惶地向岷县城抱头鼠窜。9月17日的黎明，鮮艳的革命紅旗迎着象征中国革命前途的万道彩霞，插上了臘子口的頂峯，从此揭开了甘南地区革命史上的崭新一頁。工农紅軍路过临潭和龙迭县境时，和各族劳动人民建立了血肉般亲密关系，召开了多次羣众大会，并在冶力关等地，帮助当地羣众建立了农会。向各族人民广泛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卖国、反人民、实行民族压迫的罪恶，宣傳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前景和党的民族政策以及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日救国的道理，并以“中国抗日救国軍甘肅

第一路軍”的名義，發布：“告西北漢、回、藏各族父老兄弟姊妹”的文告。具體提出“回、藏、漢一律平等”、“打倒壓迫藏民（或回民）的漢官軍閥”、“各族穷人是一家”、“宗教信仰自由”等口號和主張，使革命的真理從此開始深入各族人民的心中。紅軍每到一地，都認真貫徹了黨的民族政策，紀律嚴明，實行公買公賣，十分關懷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因而獲得廣大羣眾的熱烈歡迎，紛紛替紅軍帶路、購買糧草、安排住宿。當紅軍向甘南各族人民告別時，廣大貧苦羣眾扶老攜幼，依依不捨地遠道歡送，殷切盼望紅軍早日回來。有的羣眾還一直追送紅軍到陝北抗日根據地。在這以後的白色恐怖時期，許多羣眾冒着生命危險，掩護紅軍留下來的傷病員，並將紅軍遺留下來的革命標語、布告、手扎乃至路條、糧票等紀念物都細心妥善地珍藏起來，一直到解放。上述事例，充分說明了紅軍長征經過甘南時在各族羣眾中產生的深遠影響和在甘南歷史上的偉大意義。正如毛主席說的：“長征是歷史紀錄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紅軍長征在甘南播下了革命的種子，使甘南各族勞動人民深深認識到只有跟着中國共產黨走，才是唯一可以將自己從封建壓迫剝削下解放出來的道路。

1943年在臨潭縣爆發并和隴南其它各縣匯集在一起的轟轟烈烈的農民運動，就是受到中國工农紅軍的影響，各族羣眾不堪忍受國民黨反动派和封建統治階級的殘酷壓榨的情況下爆發的。甘南地區的起義在1943年春天經過短期醞釀發動過程，首先在臨潭縣冶力關爆發。當地藏、漢羣眾在“官逼民反、不得不反、若要反、免糧免款”的口號下，樹起“飢民團”的義旗，僅以兩天的時間即攻入縣城，捉殺了偽縣長。這一正義的運動立刻獲得全縣各族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僅五、六天時間內在臨潭縣便發展到包括漢、藏、回三個民族成份的八千多人，并很快地和臨洮、康樂、渭源、岷縣、武都、西固（今龍迭縣）等隴南十多個縣的起義大軍匯合。明確提出了：“抗日救國、打倒國民黨、建立共和國”的口號，宣布了嚴明的紀律，因而，大大鼓舞了各族人民羣眾向反动派鬥爭的信心，獲得了各族人民羣眾更加廣泛和熱烈的支持，紛紛起來投入起義隊伍。這一規模浩大的各族人民聯合的起義隊伍在最盛時，各縣總計達到十萬人左右，并在當地羣眾的積極支持下，不斷歼滅整排、整連的反動軍隊，狠狠地打擊了國民黨和地主階級在起義地區的反動統治，牽制了國民黨反动派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包圍陝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反動軍力。（國民黨反动派的這次反共高潮，由于黨制定了正確的鬥爭路線和策略，再加上國人民和進步人士的反对，以及各地紛起的民變事件，終于迫使其陰謀活動遭到可恥的失敗。）這次起義，在國民黨反动派極盡燒、殺、搶掠等法西斯手段的瘋狂鎮壓下，後來為了避免起義地區的羣眾遭受犧牲迫害和保存起義的實力起見，將大規模統一的武裝鬥爭分散為小規模灵活的武裝鬥爭，使鬥爭始終堅持了下去。特別是在1945年以後，由于得到中國共產黨“甘南事變工作委員會”（後改為“隴西工委”）的領導，起義地區十多個縣普遍建立了黨的組織。在武裝鬥爭的同時，積極開展了政治鬥爭，向各族廣大羣眾宣傳了黨的各項政策和解放區的建設以及解放戰爭的發展情況，揭露了國民黨的造謠，進一步組織羣眾起來反抗國民黨派糧、派款、抓壯丁等，从